



电化教育丛书

DIAN
HUA
JIAO
YU
CONG

传媒 教育 现代化

—— 教育传播
的理论与实践

SHU

宣伟伯 合著
余也鲁

内 容 提 要

本书较全面地论述了电化教育（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全书包括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代序），介绍了传播学的发展历史和研究的内容以及它与电化教育的关系；第二部分（第一、二章），论述电化教育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能遇到的问题；第三部分（第三、四章）论述了电教媒体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第四部分（第五、六、七、八章），研究电化教育的教学实践活动；第五部分（第九章），介绍了教学评价的重要性和主要方法。本书可供电教专业人员和广大教师学习参考。

责任编辑：徐迎

传媒·教育·现代化

——教育传播的理论与实践

宣伟伯 合著
余也鲁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开本 736·965 1/32 印张 8 字数 135 000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2 450

ISBN 7-04-000914-5 G·90

定价 2.35 元

电化教育丛书编委名单

主编：南国农 李运林 李 奈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学儒	孙天正	孙明经	庄秀娟
李运林	李克东	李 奈	周君达
南国农	徐仁声	高汝森	梁育腾
萧树滋	梅家驹	舒泽湖	谢景隆
廖泰初			

12/11/27/03

前 言

七十年代末以来，我国电化教育进入了一个充满了希望和活力的崭新的发展阶段。电教队伍日益壮大；电教在提高教育质量、增进教育效率、扩大教育规模方面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电教日益为更多的人们，特别是广大的教师和学生所了解和赞赏。随着新技术革命时代的到来，电化教育越来越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

我国电化教育在发展中也有不少困难和矛盾。当前的主要矛盾是电教人员的培养和教材、资料建设，而后者是矛盾的焦点。去书店看看，电教专业书籍和参考读物实在太少，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必将影响我国电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

我们编辑这套丛书，就是想为解决问题，贡献绵薄的力量。

这套丛书，从电教理论、电教媒体、电教实践、电教管理四个方面，对电化教育的基本问题，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可供各级各类学校教师、高等学校

学生、电教专业人员以及希望了解电化教育的同志们阅读参考。

《电化教育丛书》编委会

1986年7月

著 者 简 介

宣伟伯 (Wilbur Schramm) 在国内常被译为威尔伯·施拉姆, “宣伟伯”是他本人用的中文名。宣伟伯博士是传学研究者, 传播教育工作者, 也是集传学大成的一位学者。他编的《传播论文集》(Mass Communication, 1954年初版) 与《传播的过程与效果论文集》(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1954年初版), 都是传学研究开先河之作, 到今天仍是大学传播课程的必备书。

宣氏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即倡导媒介教学, 为最早研究教育传播的美国学者。他所著的《大媒介与小媒介》是西方的“电化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总评。

宣伟伯原为伊里诺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一九五六年到斯坦福大学传学研究所, 并担任 J. M. 白克讲座教授, 先后共十七年, 不少当代著名传播学者都是他的门生。过去十五年中, 他两次获 Kappa Tau Alpha 最佳传学研究奖; 一九七二年获密苏里大学金章奖以志其在传学上的卓越贡献; 一九七五年, 夏威夷东西中心授予他“最高荣誉

研究员”衔；同年，获英国开放大学颁予荣誉博士学位。一九七八年，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传播访问讲座教授。

宣氏一九八二年夏初偕余也鲁教授一同访问中国，在穗、沪、京大学中讲学。

宣氏现年七十八岁，现任东西中心传学研究顾问。

余也鲁教授六十年代在斯坦福大学随宣伟伯博士习传学，一九六七年自美来港，担任浸会学院高级讲师，创设四年制传理学系，并任社会科学院院长。

余氏为最早介绍传学给香港及亚洲的学者。一九七四年，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出任传播学讲座教授，兼任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及传播系系主任。一九七八年，创设研究院传播硕士班，担任班主任。余氏之教学与研究与香港传媒之现代化密不可分，现任传播部门工作者不少出其门下。

余氏曾主编英文《传播季报》，著有《杂志编辑学》，《门内门外——与现代青年谈现代传播》，译述有《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美国史纲》，《顽童流浪记》等十数种，并编有英文《亚洲的妇女与媒介》（Women and Media in Asia），《香港传播资料索引》等书。

《世界名人录》、《国际名人录》均收有余氏

的评传条目。

余氏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厦门大学客座教授，澳门东亚大学及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学术顾问。

· 代 序 ·

传播研究的开始、发展与前景，及与教育传播的关系

一、传 的 行 为

“传学”的研究虽然是二十世纪的事，但它所探讨的人的“传的行为”，则与人类的出现同样古老。

原始人从不断的观察与体验中，学会了怎样从云的形状和颜色的变化，来预知风雨；从河水的纹路与流速，可以知道水的深浅。他没有语言，靠着断续的声音、面部的表情和手势，来表情达意，发号施令。他结绳来记事，在穴居的石壁上刻下他见到的第一只老虎或者黄莺。他逐渐发展出有系统又能为其它原始人了解的语言。他也许发现女人喜欢花朵，于是用美丽的玫瑰来表达抽象的爱情，把新鲜的红玫瑰献给心爱的人。又用祷告来传达对上天的敬畏。

就这样，他和其他的人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开拓我们今天所生长的大地，并把经验、习俗、规范、知识传给新生的一代。

这里所说的虽然只是根据现代人的经验和有纪录的历史作的推测，但相信和当时真实的情况相差不会太远。原始人从自然的变化中得来的信息，帮助他找出了自然变化的规律。他与他的朋友，藉着声音与手势交换信息，因而产生有组织的行动。一朵玫瑰、一声祷词，都代表一个信息，通过不断的信息的传递、交流，建立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建立起了社会的秩序。

高低大小的声音、挥拳、鼓掌、蹙眉、微笑；一朵玫瑰或者一枝山茶花；壁上的石刻老虎或者一幅画；一篇演讲；一首诗或者柔情蜜意的情话；不论用的是手势或语文，都是传达信息的符号，在两个人或许多人中间传递，构成了人的永无休止的传的行为。

真的，有烟的地方就有人，有人的地方就有传。传的行为太普遍了，就象空气，反而不觉得它的重要，一直没有谁把它当作象历史、地理、生物或者物理一样，来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可是人类在传的方面经验丰富，以及传在人的行为中的普遍与深入，已不是任何其它经验可以比拟的。

我国有纪录的六千余年的历史，留下的古籍浩瀚如海，所录下的祖先在传的方面的经验与思考，若能拿科学精神加以分析，归纳成条理，我们应该早就有一门相当完备的传学理论了。（《战国策》

和战国时代诸子的著作，就是很好的研究说服理论的泥土。)可惜，我们象在许多别的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中一样，让欧美抢了先。传学介绍到中国，在中国的大学里讲授并进行研究，还是近二十年的事。这段历史且留到后面来讲。

其实，即使在美国这个传学研究的发源地，对人类传的研究也不是一开始便很有计划、有系统地来进行的。传学的原理的发现，很象自然科学上的不少发现，都是偶然或不经意中得来。虽属偶然，但研究工作者的敏锐的观察力与锲而不舍的精神，加上“团队”也就是合作的努力，才能获得几许辉煌成果。

二、传学的开始

美国传学研究虽说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尾至五十年代末那段时期。但在这之前，人类文化史上已有不少关于传的概念。亚里斯多德对传的效果的看法，特别是论辩学方面的，到今天仍有影响力。不过把人类的传的行为作有系统的科学性的探索，而且对今天的传学的建立，具有不可否认的影响力的，大家都归功于五个人，把他们叫做“传学的奠基人”。讲西方传学的历史，总是从这五个人开始。

这五个人是政治科学家拉士维尔 (Harold Lasswell)：原为数学家后来成了著名的社会

学家的拉兹士裴德 (Paul Lazarsfeld) ; 社会心理学家和群体作用的研究者拉文 (Kurt Lewin); 实验心理学家后来成了社会心理学家的贺夫兰 (Carl Hovland) 和原为文学家、新闻记者后来成为传学研究集大成的宣传伯 (Wilbur Schramm), 也是本书的作者之一。

今天出版的传学论文集, 很少能没有这五个人的著作, 而他们所教出来的学生多已成为五十年代以后三十年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前四位均已先后谢世, 但宣伟伯虽已高龄七十八, 仍研究写作不辍。一九八二年四月, 本书的两位作者一同访问中国, 作了几次演讲, 为中国的传播教育及传学研究催生。

五人中有四个人首创过传学研究中心, 树立传学研究的规范。唯一没有创研究所的是拉士维尔, 但他的著作十分丰富; 一九七八年逝世时, 已发表的著作逾六百万字, 另外还有三巨卷研究“世界史中的宣传与传播” (Propaganda and Communication in World History) 的书已交付印刷。

这五个人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他们的一生事业都极富戏剧性, 早年都在最出色的大学攻读。他们的老师与朋辈都是出色的学者。他们生性勤学, 博览群书, 不为自己的主科所囿; 愿意也有勇气踏出自己的小圈子, 面对现实世界的问题, 进入传的科

际性和媒介性的研究。虽然都不擅词令，也非很出色的演讲者，但都是少有的第一流科学研究者，循循善诱的好老师，而且都是著述甚丰。

三、传学的发展——在美国

我介绍了五位与传学发展有关的美国学者，其中四个人都已谢世，他们被宣氏称为“传学之父”，宣氏自己则是横跨传学研究两个时代的人物。在他手中，他把前边讲过的四个人的学说和其他在新闻、广播、电视上已建立的理论，综合起来，建立了一个新的我们现在叫做传学（communication）的新研究领域，并把这个字加在伊里诺大学原有的新闻系的名字后面，变成了“新闻与传播系”，来反映已大大扩展了的教学与研究领域，同时为传学的博士课程铺路。

过去四位奠基人所工作的研究中心多是独立的单位，但当传学研究进入发展阶段后，不少大学发现有将社会研究与现存的院系联系起来的必要，新的传学研究中心便在和伊里诺大学相似的结构下纷纷设立。

一九四〇年，美国不少大学已设有新闻、广播、电影、语言等类学系，系主任都需要有博士学位。而在这些系里教书的人，也常常要求有博士

衔。这些系也就开始提供传学的博士学位，开设新的课目，包括传学理论，传播史，传学研究方法等，添上从其他社会科学的院系选修的课目。教与学的人都多了，研究的小组也就多了起来。例如爱俄华大学便成了一个“受众研究所”，研究读者阅看日报与周报的习惯。明尼斯达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也先后扩大了原有的新闻系，易名为“新闻与传播系”。斯坦福大学则干脆把“新闻系”改为“传播系”并把本属语言系的广播与电视并入传播系中。

把传学研究中心放到大学的院系中来发展，始自伊里诺和斯坦福两所大学，也可以说是宣伟伯构想的实现。

新中心的工作是一方面训练传播系的研究生，一方面建立研究系统，把优秀的青年吸引到中心来攻读博士学位。中心与社会科学的院系保持紧密联系，常常邀请他系的教授、包括人类学、心理学和教育学者来参加讨论会和研究计划，协助指导研究生。不过，有的大学则不分设中心，把这些工作分给研究院的教授去担任。

同时，新闻、语言、广播与电影这些比较偏重专业与技术教学的系，也开始认识到研究工作的重要，得许多由社会研究中心在做的工作正是他们份内应做的事。这些系也开始了自己的受众研究、

内容分析、传播效果等研究计划。

最近二十年，过去由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传学研究，现在都由新闻或传播系接手过来。全美参加传学研究学会为会员的逾千人。单是研究“电视与人的行为关系”已完成的计划，就已有二千三百个之多，而且大多为这些新的研究中心的产物。

这还只是传研究与传播教育一方面的发展。其实在人类学、语言学、甚至模控学中也展开了对传的探究。许许多多的教育学院和师范大学，都设立了“教育传播”（电化教育）系。社会科学的课程表上也增设了传播课，连神学都有不少传学与传播专业的课目，不少世界著名的学会开始讨论与传的行为有关的问题，连古老的“美国经济学会”也发表一连串谈传通的论文。

另外一股潮流来自实际从事传的活动的人——广告工作者、传播发展专家、公众关系顾问、社区关系联络人。这些人工作上需要对传的行为有认识，能设计各种社会运动，改变社会风气，或建立新形象，也开始了传播研究。

四、其他国家的发展

传学研究倒不是美国的专利品。拉文和拉兹士斐德的学问源自欧陆。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德国和法国，都有一些小规模传学研究在进

行。一九六〇年，宣伟伯发表电视对儿童的影响报告书时，英国的女社会心理学家侯墨维特博士（Hemmelweit）也在伦敦大学发表了她的《电视与儿童》的研究报告。她又写过《青少年与成人对媒介的使用与品味》一书，更为著名。

不过，不象美国，英国的传播研究虽然近年来相当蓬勃，但大学对此并不热心。全英国的大学还没有一所可以提供学士学位的传播或新闻系，几个传播系都设在理工学院中，当作专业技术来对待。设在赖斯特大学（Leicester University）的一个传播研究中心，和其他几所大专学院的研究中心一样，都因受到教育经费削减的影响，几乎一蹶不振。英国的报业人材仍靠报社自己来训练。英国到一九七〇年才有第一个新闻硕士班，设在加底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

英国人研究媒介的发源地不是社会科学，而是文学；而他们的经典不是二拉一贺，而是R．威廉斯（Raymond Willianes）的一本薄薄的叫做《传播——六十年代的英国》（Communications Britian in the Sixties）的纸皮书，再添上R．贺加特（Richard Hoggart）的《写读的用处》（The Use of Literacy）。五十年代，他们所注意的是媒介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引发的问题。媒介，在他们的眼中，是英国社会与文化发

展的历史产物。他们比较喜欢工业革命前期社会中人们对文学的高级品味，误认为传播媒介已腐蚀了这品味。可是进步的一派则放下文学转而注意传播媒介，认为工人阶级的品味有其积极的价值。

六十年代，英国知识分子中的新左派使马克思主义再度兴起，开始热烈讨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与功能。法兰克福学派、卢卡斯和沙特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家成了研究的热门。英国今天的传媒研究是在这两大思潮冲激中进行。

英国目前传媒讨论的中心是：（一）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性质；（二）文化事业的发展，主流意识的制作与散播，和允许抗衡文化存在的空间这三者间的关系。而在态度上是反对教育和媒介事业的现状的。

英国开放大学提供的传播课程很可以反映英国传播研究的现况。制订课程的人中有的强调美国传播研究，以多元化社会和实证方法为基础。有的课程则从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点来描写媒介。二者势均力敌、互不相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这股“批判性”传播研究在北欧展开之后，对联合国经社组织颇具影响力，也燃点起了“新世界新闻秩序”的大辩论。参加这种研究的“批判”研究者都在政治上有强烈的立场。他们的研究不是先有传播问题，再去作深入